

歷史學家的生命力

侯坤宏 前國史館修纂處纂修

一、前言

生命力 (vital force)，有時也稱「生命原動力」 (vital impetus) 或「生命原則」 (vital principle)，是生命現象中體現出來的一種能量。(註1) 本文所謂「歷史學家的生命力」，指的是歷史學家為了追求歷史真相，將畢生精力放在他所關心歷史議題的研究上，也可以說是對自己本分工作的一種根本信念，一種堅持。當然，任何學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，歷史學亦然。歷史學之所以能夠成立，來自社會的要求，也來自歷史學家的探索和創新。史學家不應當抱殘守缺，滿足於業已取得的成果，要能不斷地從事研究工作，不斷地有所創建。(註2) 這是史學家的天職，也是史學家之可以史學研究為終生志業的動因。

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興趣，不在此則在彼；興趣就是生命，剝奪一個人的興趣，等於剝奪他的生命，鼓舞一個人的興趣便能增強他的生命。(註3) 對於歷史學家而言，研究歷史就是他的興趣，也就是他的生命，專業而嚴謹的歷史學者，會將歷史研究工作視為其生命的主要部分，也是他所以生存的理由；研究歷史，可以增加生命的深度、厚度和廣度，也更誘發歷史學家專致於他的研究工作。

《隋唐帝國形成史論》的作者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常說：「學問可以造就為人」，(註4) 什麼樣的學問，成就什麼樣的人，歷史學家

又是什麼樣的人？長久以來，筆者一直關心「歷史學家之何以成為歷史學家」這個問題，也就是：一個好的歷史學家應具備哪些基本條件？經多方思索發現，透過「歷史學家的生命力」這個問題，可以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歷史學？什麼是好的歷史學家？

什麼是歷史學家的生命力？以下從研究歷史是歷史學家的天職、透視時代是歷史學家的功力、骨氣是歷史學家應有的風範等方面，談談一些個人的體會與看法。

二、研究歷史是歷史學家的天職

醫學上對於喪失記憶及記憶能力，稱為柯薩可夫症候群（Korsakov's Syndrome），患者等於失去了歷史意識，他們所失掉的不是事物，而是他們迷失人生方向，失去靈魂和人格主體。（註5）作為個人，沒有人在患健忘症後，還可以清楚、理性地處理日常事務。作為人群整體，往往只活在今天，忽略過去。歷史知識，恰是治療集體健忘症的良方。（註6）

輕視歷史，就是輕視自己，因為不看重自己的歷史，就不能好好地照顧自己。尊重歷史的人，會思考如何取法歷史，而使得他的人生變得更為豐富。如果我們想了解一個人，就必須看他的傳記，讀他的歷史；要了解一套文化系統，便須認識其傳統及歷史。沒有歷史的文化，常會自我矛盾。（註7）這就是歷史學和歷史學家之所以需要存在的

理由。

如果說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則歷史研究者的工作，有如擦掉蒙在鏡子上的灰塵，讓鏡子更加光潔，使鏡中影像盡可能與原有的歷史事實一致。（註8）歷史學家應該以堅毅不撓的研究精神，探索未知的歷史領域，使枯木和陳年的骷髏重生，同時也設法使原本被認為不具價值的東西變為主體。（註9）歷史學家就在這裡，展現出他對歷史資料的解讀能力和對歷史事實判斷的學術功力。

歷史研究者具有雙重觀察者的身分，既要向外觀察，更要向內省察。向內省察的功夫愈深，向外透視的能力也越強。對史學研究者而言，好好體驗現實生活，了解現存人事的種種糾葛，是培養觀察過去的一項重要訓練。在此，歷史學家必須具有完全投入和完全超越的雙重本領。（註10）合格的歷史學家，要能「向外觀察，更要向內省察」，既要能「完全投入」，也要能「完全超越」，其中涉及歷史學家對外觀察的態度以及對自己人品的要求。做到確是不易，卻是稱職的歷史學家所應達到的一種最起碼的標準。

以上似乎將「生命」（歷史學家）與「世界」（研究、觀察的對象）分為「主體」與「客體」，「自我」與「對象」似乎彼此對立，一般人很容易將自己視為主體？如何揚棄這種將「自我」視為思維主體的做法，德國思想家狄爾泰（Wilhelm Dilthey, 1833-1911）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法，即應根據「生命關聯體」（Lebenszusammenhang）

的概念，來認識生命及其對象。狄爾泰認為，以往認識論的缺點之一是僅將客體當作認識的對象，而將主體和客體的關係，看作是一種認識者和被認識者的關係。事實上，主體不僅是一個認識者，同時也是一個想像者和行動者。他會通過自己的知、情、意機能，去領略、體會、處理所面對的客體。因此，他與客體之間所具有的，乃是一種生命整體與其對象的關係，即生命關係，或生命聯繫（Lebenszug）。（註11）充滿活力的歷史學家，可以根據他對外在及內心的觀察（體驗），來了解各階段歷史的變化，進行必要而且是有意義的研究，這也是歷史學家生命力的一種呈現。

我們的內體生命被限定在一小部分的時間和空間之內，但我們的精神生命卻可以不受限制。個人的生活往往令人沮喪，有時甚至痛苦得難以忍受。但從歷史的透視來看個人生活，把它視為是全人類生命中一個小片斷，那麼許多無可避免的災難，就不會那麼令人難以忍受了。（註12）人類對歷史的認識，實質上是對自我的窺測。歷史學家要能超脫時間和空間的限制，用冷眼來觀察外界種種現象。歷史是一條永恆的河流，我們沿著歷史之河漫溯，在河中不斷尋覓；只有通究，我們才能使自己短暫的一生變得無限。（註13）

當然，歷史學家不應該忽視歷史知識和讀者普遍理解之間的關係，此種關係包含了當代道德和政治領域的因素。作為歷史學家，提供真實給那些需要它的人，是歷史

學家應當承擔的任務；對於歷史知識的尋求，在本質上是這個任務的一部分。（註14）歷史學家的責任在此。而歷史學家的社會角色與其責任是互相聯繫的，一個有良心的歷史學家，不會只重視個人的利益，他會關心社會或國家的發展與命運；歷史學家的求真要求與史學的經世目的是相互聯繫的，當歷史學家的責任受到歷史學家的社會角色驅動，就會將其所學化為社會所需的經世思想。（註15）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說，歷史學家不光是為研究而研究，研究中也應該考慮到應盡的社會責任。

歷史研究者也在創造歷史，用心靈來創造歷史；也可以說，史學是史家心靈的歷史，是史家靈魂躍動的軌跡。（註16）研究歷史就是研究人性，歷史即人性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的具體表現。（註17）作為歷史學家，提供符合客觀事實的歷史陳述，是他們必須承擔的職業（道德）責任。歷史學首要關注的是生產歷史知識，而歷史學家的核心道德責任就是說出事實。「說出事實，你就盡到了責任。」當然歷史學家很難擺脫道德或是政治判斷，他們可以盡可能地努力去形成這兩種判斷，任何方法只要是可以提高人們的自我認知，都值得去追尋。（註18）

存在主義作家卡謬（Albert Camus, 1913-1960），曾在其著作中提及演員的恐懼感，更有甚者，還包括演員的無力感；其實，當作家的創作力貧乏之際，恐怕會比演員還要脆弱。（註19）如果用在歷史學家身上，當他

陷入創作力貧乏困境時，就要反身自問，是否已是江郎才盡？還是自己不夠努力？這對以歷史研究為終身志業的歷史學家而言，如果他能將研究視為天職，這種現象是不可能發生的。

三、透視時代是歷史學家的功力

歷史學家應該關切周遭種種境遇，以喚起自己對歷史研究的熱情，因個人對歷史的認知，與對當代社會的理解息息相關，想了解歷史和我們的關係，最好的方式是先看看現在，再追問過去。（註20）當今社會有許多各式各樣的「非歷史」、「假歷史」，歷史學家有責任去拆穿這些；擁有政治權力者，常會有「反歷史」的傾向，如果歷史是透過社會主宰者的詮釋觀點寫成的，歷史學家要能不畏權勢，不為任何意識形態（政黨、宗教、民族、宗族、地方意識等）所蒙蔽，透過研究歷史，讓我們回到真實的世界。歷史學家永遠沒有虛構事實的權力。（註21）

有些歷史學家受到學院派訓練的桎梏，其著作匠氣十足，沒有生氣；另一些歷史學家受到黨派意識影響，處處為自己黨的利益設想，甚至為保持自己的職位，不惜扭曲歷史。這些都不是好的歷史學家。歷史學的精神在根本上是批判的（critical），（註22）若歷史學失去批判立場，依附政權，歷史成為被他利用的工具；一味順承上位，易讓人感覺乏味，對歷史學者而言，這是他的悲哀；

濫用歷史者，將成歷史罪人。

雖說歷史學家應堅守崗位，研究歷史應具備批判性，但未必每位歷史學者都會勇於批判，尤其是當他面對自己團體（如民族、國族、政黨、或與自己有關的任何團體利益時），應有的批判精神不見了，甚至還會轉成袒護。

歷史學家的言論，離不開他所居的社會位置，所以嚴格來說，並沒有完全客觀的歷史分析，因為歷史學家會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，客觀是相對的。歷史學家生存在不同的社會關係網絡中，一個社會對象，隱藏一系列的社會關係，只有分析這個關係系統，才能了解它是怎麼運作的。（註23）歷史研究的深入，有賴對種種社會關係的分析，尤其是對擁有權力及擁有財力者。

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（Pierre Bourdieu, 1930-2002），透過「宰制」的概念來思考社會，依其說法，從最枝微末節的日常行為裏，都可以發現宰制關係的存在；宰制關係也表現在不同場域、不同位置的社會施為者（agents sociaux）所採行的策略上。因此需要透過社會學來客觀呈現這些宰制關係，或藉著提供被宰制者一套理論與實踐的工具，以揭露宰制的機制及挑戰宰制的合法性。（註24）這時候的歷史研究，就可以借助於社會學所提供的分析工具與概念。

歷史學家關心現實，但歷史學家與現實社會之間，不可以太「離」，也不可以太「黏」，（註25）應該保持一個適當的「觀

察距離」，這裡所說的「觀察距離」，主要指的是歷史學家的一種合適的心態。歷史的反省，要從自己的時代、自己的問題反省起，（註26）這樣，歷史就不僅僅是過去的東西而已，它還具有現實的意義。當然，歷史學家看待任何歷史事件，應該具有超脫的眼光與批判的態度，這是透視時代的利器，也是歷史學家所應具備的基本功。

四、骨氣是歷史學家應有的風範

劉夢溪在〈陳寅恪的學說為何有力量〉一文中說：「我們做人文學術研究的人，無論文學、史學還是哲學，常常有一種無力感——這些學問有用嗎？人文學術有什麼用呢？我們常常感到人文學術是沒有什麼力量的，內心常常充滿了無奈。但念了陳寅恪先生的書之後，對他的學問有一定了解之後，我覺得，史學、詩學等人文學術是有力量的。……陳寅恪先生的學問之所以有力量，首要的是因為他是一位思想家。……陳寅恪先生的學問所以有力量，還由於他的學問裏面有一種頂天立地、獨立不倚的精神。」（註27）

陳寅恪之傑出，一在他的學問，一是他堅持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，在任何壓力之下決不屈服，這就是一種骨氣，也是歷史學家應有的風範。文革期間，陳寅恪公然倡言不宗馬列，不學政治，以保持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，當時的中國知識分

子能頂得住壓力的，幾乎只有他一人。梁漱溟雖有骨氣，但他被批判若干次，和毛澤東對面爭論，最後還是做了檢討。（註28）過去筆者在閱讀陳寅恪的著作及其生平時，對於其所揭櫫的「獨立之精神」與「自由之思想」，最為佩服，自己在研究近代歷史的時候，也會以此標準來衡量史事與品評人物。

「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」，是中國古代以身殉道的歷史學家，陳寅恪的「獨立之精神」與「自由之思想」是近代史家的典範。對歷史學家言，名利（位）是致命的吸引力；其實，「學術上若真有成就，名不求而自至」，「就權與位而言，尤於治學有百害而無一利」，歷史學家應該專心一意的做學術工作。（註29）

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季羨林（1911-2009），對中國大陸在1966-1976年間的文革動亂，有如下的反省：「最可怕的是，我逐漸發現，十年浩劫過去還不到二十年，人們已經快要把它完全遺忘了。我同今天的青年，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談起這一場災難來，他們往往瞪大了眼睛，滿臉疑雲，表示出不理解的樣子。從他們的眼神中，可以看出來，他們的腦袋裏裝滿了疑問號。他們懷疑我在講『天方夜譚』，我是故意誇大其辭。他們懷疑，我別有用心。」這讓他心裏十分不解，萬分擔憂。這場空前的災難，若不留下點記述，則後代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，將來氣候一旦適合，還會有人發瘋，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，所以他才動筆寫《牛棚

雜憶》乙書。(註30)

由於中共對歷史的濫用，導致中國大陸成為重災區。1949年以後，中共史學家即存在以馬克思與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歷史解釋體系，彼等認為：馬、毛思想，是從歷史與革命的實際中抽出的總結，具有普遍性真理。所以，史學工作者所作的任何歷史解釋，並不是為了探索歷史客觀的事實，祇是為馬、毛思想作註釋，更進一步證明這些經典的普遍性真理。(註31)毛澤東晚年很多作法，都從歷史中找根據，但他的作為，卻與實際需要愈離愈遠。如1958年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「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之決議」，毛為《三國志·張魯傳》親自作註，印發與會者。他對張魯的五斗米道實行的「置義舍」（免費住宿）、「置義米肉」（免費吃飯）等措施，極為欣賞，認為人民公社在中國是有歷史來源的，以此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歷史依據，最終卻造成歷史慘劇。(註32)

在中共極權統治下，我們看到其對歷史的糟蹋，但這種現象並不是唯一的。在此之前，我們也看到，西方惠格史家及戰後日本史家對歷史的誤用與逃避。惠格史家研究歷史有政治目的，英國史家湯恩比（Arnold Toynbee, 1889-1975）批評惠格史家說，他們研究過去，是為了政黨的目的；他們探討過去，只是為了尋找例證，拿來爭論現在的事情。(註33)而日本在戰敗後，一般民眾在政治意識上，傾向於自視為戰爭受害者，

對做為加害者的自覺比較遲緩。戰後日本歷史學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研究也相對遲緩，這是一嚴重的缺陷。做為歷史學者，絕不能忽略國家權力及其支持者「對歷史的占領」，這牽涉到歷史學者的良心與責任。(註34)

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，是要將權勢機構所剝奪的歷史還給社會，他應該了解社會的需求，(註35)做出應有的努力。雖然歷史是沈默的，可以被人玩弄於一時，但歷史卻自有其無可磨滅的尊嚴。(註36)歷史學家應該盡全力維護歷史尊嚴，不畏權勢，不求名位，這是有風骨的歷史學家所應培養、展現的一種風範。美國政治哲學家、倫理學家羅爾斯（John Rawls, 1921-2002）曾說：「我是對政治感興趣，但對擁有政治生涯不感興趣，我想我極不擅長此道。」(註37)羅爾斯研究政治，但他不從政，謹守作為學者的身分，他的想法與做法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
五、結論

2015年7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《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》，主編之一陳紅民在〈序言〉文末說：「『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』是個高深莫測的問題，很難有統一的標準答案。然而，它又是每一位嚴肅的歷史學家必須面對的問題。」(註38)的確如此，但我想問的問題是——「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家？」如何成為一位稱職的「歷史學

家」？

本文所謂的「歷史學家」，指的是以歷史研究為專業的研究工作者，當然「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（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）」，（註39）只要他擁有一種求真實的人生態度。成為歷史學家，自有其應具備的條件，前文中特別提到：研究歷史是歷史學家的天職、透視時代是歷史學家的功力、骨氣是歷史學家應有的風範等三項，這都可以說是歷史學家展現生命活力的根源（基礎）。此外，底下三點也非常重要：

（一）歷史學家的自我了解與自我訓練：德國哲學家康德（Immanuel Kant, 1724-1804），在其三大批判裡處理了：我們能知道什麼？我們應該做什麼？以及我們能夠希望什麼？等三個問題，這些問題其實可以歸結到「我們是誰？」這個大問題上。康德所立下的批判傳統，實質上也是指向人類的自我認識。同樣的，社會學家韋伯（Max Weber, 1864-1920）對於自我認識也非常看重，他用了一個概念——「清明」（self-clarification），所謂「清明」就是指「自我了解」。（註40）做為一個歷史學家，也需要了解自己的特長及缺點，才能發揮自己所擅長的方面。歷史學家要能隨時訓練自己，「一個人做學問，如果努力不懈，他的方法、悟解一定能越老越進步，也越遼密。」「學問是由心力與時光交織而成，缺一不可」，（註41）歷史學家的努力不會白費。

（二）歷史學家可以從研究工作中增加生命的豐富性：在人文社會的世界裏，想走探索知識的路，就要有忍受寂寞的心理準備，研究是件寂寞的事，人文學科要「溫火慢燉」，單兵作戰，相對而言更是寂寞。（註42）歷史學是人文社會學科之一，歷史學家在大多數時間，都是孤獨的面對眾多的史料堆中。但稍可堪慰藉的是，透過歷史研究，可以增加生命的豐富性，就如同德國哲學家、新教神學家施萊爾馬赫（Friedrich Schleiermacher, 1768-1834）所認為的：「人必須在自身中發現自己的使命，必須在自身把握和堅持他的本質規律，即他的自我。」（註43）我們所要理解的生命，既是我們自己的生命，也是他人的生命，也可能是我和他人共同組成的社會、歷史、民族的生命；（註44）而歷史學家參與歷史、投身歷史，就是一種自我實踐的歷程。（註45）

（三）歷史學家應該要反省自己所從事的工作：或許受到後現代主義挑戰，歷史學家有必要反省自己所從事研究工作的性質。（註46）嚴謹的歷史學研究，應該有其認識論上的思考，也就是對此學科的原理原則、假設及結果之批判，以確立其邏輯根源、價值，這種警覺，對歷史學者非常重要。（註47）「歷史哲學」（philosophy of history）有兩種意義：一種是提出某種形上學式的歷史解釋，以便說明人類的事情為什麼是如此這般；另一種是反省歷史學這門學問本身的問題，檢討其認知取向的性質與優劣等。（註48）任

何領域的歷史學家，都不能忽略反省「歷史學」這件事情的重要。

總之，真理唯有透過揭示才能顯現出來，歷史研究工作本身，便具有一種內在的生機與活力，惟有不斷的探索，研究者方能有所感悟，蓋「歷史之學，非故紙之鑽研，而為生命之貫注。」（註49）當然，即使是一位以研究歷史為終身職業的人，對於「歷史」這一學門，想保持一種新鮮的看法，就要不斷「吸收新知」，並要能「自我超越」。畢竟歷史學是一門充滿動力的學科，歷史學家是一群充滿生命力的學人，歷史學家透過研究成果，展現其旺盛的生命活力。

【註釋】

1. 彼得·A. 安傑利斯著，段德智、尹大貽、金常政譯，《哲學辭典》（臺北：貓頭鷹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486。
2. 瞿東林，〈史學的活力〉，收入瞿東林編著，《史學與史學理論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538-539。
3. 1948年梁漱溟在寫給他兩個兒子的信中又說：「一個人興味所在即其心之所在，即其生命之所在。」梁漱溟，〈寄寬恕兩兒〉（1943年），收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，《梁漱溟全集》，第1卷（濟南：山東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359、373。
4. 李濟滄，〈譯者後記〉，收入谷川道雄著，李濟滄譯，《隋唐帝國形成史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362。
5. 喪失記憶等於喪失連續性，喪失了「過去」及「未來」，孤立地存在於沒有意義而時常變幻的瞬間之中。吳光明，《歷史與思考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2年），頁10-11。
6. 許倬雲，〈我們為什麼要讀歷史？——一個史學工作者的答覆〉，《歷史月刊》，第37期（1993年2月），頁45。
7. 吳光明，《歷史與思考》，頁111、120-121。
8. 葛劍雄、周筱贇，《歷史學是什麼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51。
9. 馬克·費侯（Marc Ferro）著，張淑娃譯，《電影與歷史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35。
10. 朱孝遠，《史學的意蘊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23。
11. 安延明，《狄爾泰的歷史解釋理論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1999年），頁35、87。
12. 羅素著，何兆武、蕭巍、張文杰譯，《論歷史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51。
13. 彭衛，《穿越歷史的叢林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7年），頁1、3、8。
14. 喬納森·戈爾曼（Jonathan Goman）著，李娟譯，〈歷史學家及其責任〉，《新史學》，第12輯（2014年8月），頁14、16。
15. 史家的社會責任亦是必須傾助於史學之中，而史學亦必成為史家藉以經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。瞿東林，〈論史家的角色與責任和史家的求真與經世〉，收入瞿東林編著，《史學與史學理論》，頁20、24、28、34。
16. 彭衛，《穿越歷史的叢林》，頁13、36。
17. 羅素著，何兆武、蕭巍、張文杰譯，《論歷史》，頁20。
18. 喬納森·戈爾曼（Jonathan Goman）著，李娟譯，〈歷史學家及其責任〉，頁1、9、11。
19. 艾德娜·歐伯蓮（Edna O'Brien）著，陳榮彬譯，《永遠的都柏林人：喬伊斯的流幻之旅》（James Joyce）（臺北：左岸文化，2003年），頁272。
20. 杜正勝，《歷史的再生》（臺北：社會大學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21。
21. 周樑楷，《歷史學的思維》（臺北：正中書

- 局，1993年），頁59。
22. 這是1950年12月1日布勞岱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講〈一九五〇年歷史學的處境〉中所說的一句話。劉北成譯，《論歷史》，頁8。
 23. 朋尼維茲 (Patrice Bonnewitz) 著，孫智綺譯，《布赫迪厄的社會學第一課》(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2年)，頁53、67。
 24. 因為社會學是以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為其研究對象，卻沒有把社會學家自身也放進社會來進行自我瞭解，不自覺地以為社會學家可以超越這樣的影響。此時，社會學家理所當然地在自己與他人之間劃上一道界限，一方是研究者，另一方是研究的對象；一方是社會學家，另一方是一般人。而他們的研究隨之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排除在適用範圍以外。這似乎意味著：其他人是受到社會所影響的，但社會學家則不然。當社會學家強調他們可以無可質疑地進行客觀、獨立自主的研究時，此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主張本身，就已經由於和社會學的基本預設相違背，而動搖社會學自身的解釋力，甚至是社會學與社會學家的存在價值。歷史學者應引以為戒。黃厚銘，〈皮耶·布赫迪厄與反身社會學 (reflexive sociology)〉，收入朋尼維茲 (Patrice Bonnewitz) 著，孫智綺譯，《布赫迪厄的社會學第一課》，頁9、205。
 25. 周樑楷，《歷史學的思維》，頁96。
 26. 杜正勝，《歷史的再生》，頁42。
 27. 趙復三說，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，對歷史人物的取捨、臧否，其標準要如何？陳寅恪的「獨立之人格，自由之思想」兩句話，或可做為衡量的一個標準。金岳霖說，陳寅恪「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，而且也是堅持正義、勇於鬥爭的人。」李慶新認為，陳寅恪一生追求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，並能身體力行，贏得世人景仰，究其根源，應與長期精研佛典，受佛法「依自不依他」，重視獨立平等的觀念有關。劉夢溪，〈陳寅恪的學說為何有力量〉，網址：<http://books.sina.com/bg/sinablog/heart/20140310/202649166.html> (檢索日期：2016年4月7日)；趙復三，〈送慎之遷「新居」〉，《明報月刊》，第38卷第6期(2003年6月)，頁25；金岳霖著，劉培育整理，《金岳霖回憶錄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)，頁162；李慶新，〈陳寅恪與佛學〉，收入胡守為主編，《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》(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)，頁400-401。
 28. 陳在廣州時，北京要請他去做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，他不願去，提出條件：一、不宗馬列，二、不學習政治，學生也不學習政治。他有詩云：「天賦迂儒自聖狂，讀書不肯為人忙」。唐振常，《承傳立新——陳寅恪先生之學》(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0年)，自序頁ii及正文頁4、10。
 29. 這也好像是過去中國禪宗叢林祖師所謂的「不以勢位為榮」。嚴耕望，《治史經驗談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1年2版)，頁163-164、166；智祥大師註述，《禪林寶訓筆說》(臺南：和裕出版社，1995年再版)，卷下，頁50A。
 30. 季羨林，《牛棚雜憶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97年)，自序頁6、正文頁5。
 31. 中國文革時，流行所謂影射史學，常是先入為主，對於不利於自己的材料，不是絕口不提，就是歪曲篡改，用自己的目標來重新「創造」歷史。這樣，歷史就成了胡適所謂「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」了。四人幫對中國歷史的解釋，係採用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，無限拔高法家，將秦始皇塑造成為人民利益的代表，並吹捧所謂奴隸起義領袖盜跖。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歷史，唯一的目的是為打擊政治對手。影射史學不是中國才有，也不是到了文革才有，古今中外歪曲歷史的情況歷來都存在，只不過到文革時，被推到了極致。影射史學本身，實際上是專制政治下，學術泛政治化後歷史成為政治附庸的產物。1974年開始，中國曾掀起一場研究和調

- 查盜跖的熱潮，各地找出來的有關盜跖活動地點，竟達數 10 處之多。譚其驥對此，曾批評說：人都不知道在哪兒呢，怎麼會有遺跡？遼耀東，《史學危機的呼聲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7 年），自序頁 3、頁 25-26；葛劍雄、周筱贇，《歷史學是什麼》，頁 152-155。
32. 葛劍雄、周筱贇，《歷史學是什麼》，頁 176-177。
33. 就研究歷史以供現實所用這一點而言，英國史家向來便有此傳統。巴特費爾德（Butterfield）即曾指出，19 世紀的英國史家，不管是惠格黨或者是托利黨，都免不了以今論古。周樑楷，《史學思想與現實意識的辯證：近代英國左派史家的研究》（臺北：合志文化出版，2001 年），頁 41、88。
34. 永原慶二著，王新生等譯，《20 世紀日本歷史學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4 年），頁 135、230。
35. 馬克·費侯（Marc Ferro）著，張淑娃譯，《電影與歷史》，頁 71。
36. 遼耀東，〈堅持歷史獨立的尊嚴〉見其所著，《中共史學發展與演變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1979 年），代序頁 5。
37. 〈約翰·羅爾斯，為了紀錄（10）〉，網址：<http://lz.book.sohu.com/chapter-1063286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16 年 1 月 26 日）。
38. 陳紅民，〈序言〉，收入斐宜理（Elizabeth J Perry）、陳紅民主編，《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5 年），頁 6。
39. 美國史家卡爾·貝克（Carl L. Becker, 1931-1945）於 1931 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的會長講詞全文（“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”）；張隆志，〈卡爾·貝克〈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〉新譯解題〉，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》，第 8 期，頁 151-166，見網址：<http://mocfile.moc.gov.tw/files/201504/de070556-8f07-42d6-9cfe-ca4943e73f4a.pdf>（檢索日期：2017 年 3 月 17 日）。
40. 黃厚銘，〈皮耶·布赫迪厄與反身社會學（reflexive sociology）〉，頁 208-209、216。
41. 嚴耕望強調：「做學問要有潛力，先要廣泛的讀書。」嚴耕望，《治史經驗談》，頁 72、125-126、162。
42. 朱敬一，《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信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36-37、194-195。
43. 這是在他的作品中，所擁有的一種貫穿他全部著作的精神傾向。安延明，《狄爾泰的歷史解釋理論》，頁 15。
44. 聖嚴法師在林其賢為他寫的《聖嚴法師年譜》序文中說：「我的閱讀、研究、思考、寫作，動機不在於知識的滿足和販賣，而在於不得已的責任感。」安延明，《狄爾泰的歷史解釋理論》，頁 30；林其賢，《聖嚴法師年譜》（臺北：法鼓文化，2000 年），聖嚴法師序，頁 3。
45. 吳光明，《歷史與思考》，頁 140。
46. 理查德·艾文思（Richard J. Evans）著，張仲民等譯，《捍衛歷史（In Defence of History）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頁 14。
47. 套用布赫迪厄對社會學的說法。朋尼維茲（Patrice Bonnewitz）著，孫智綺譯，《布赫迪厄的社會學第一課》，頁 45。
48. 我是不想討論「歷史」與「哲學」關係（「歷史哲學」）的問題，但這裡要說的問題，似又與「歷史哲學」相關。周樑楷，《歷史學的思維》，頁 74-75。
49. 此為賀昌群所說之語。陸慶夫，〈賀昌群〉，收入陸慶夫、王冀青主編，《中外敦煌學家評傳》（蘭州：甘肅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），頁 112。